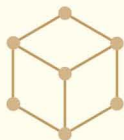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竞争力的 产权基础研究

孙国峰 著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WENHUA JINGZHONGLI DE
CHANQUAN JICHU YANJIU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孙国峰，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浙江大学、兰州大学博士后（两站），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访问学者，曾供职于浙江工商大学（2003—2013）和福州大学（2013—2018），2009年晋升教授，现任教于巢湖学院经济与法学学院。在《管理世界》《新华文摘》《学术月刊》《文史哲》《经济学家》《经济管理》等国内权威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80多篇，出版专著5部、编著1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项、国家发改委招标课题1项、中国博士后基金课题2项、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1项以及浙江省教育厅重点课题、浙江省社科联课题等10多项。2007年度浙江省优秀博士后，获得省高等学校科研成果奖等3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竞争力的 产权基础研究

孙国峰 著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WENHUA JINGZHENGLI DE
CHANQUAN JICHU YANJIU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杭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竞争力的产权基础研究 / 孙国峰著. —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22.11
ISBN 978-7-5178-4779-3

I. ①中… II. ①孙… III. ①企业文化—竞争力—研究—中国 IV. ①F27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271650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竞争力的产权基础研究

ZHONGGUO TESE SHEHUI ZHUYI WENHUA JINGZHENGLI DE CHANQUAN JICHU YANJIU
孙国峰 著

策划编辑 任晓燕
责任编辑 任晓燕
封面设计 杭州望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时俊龙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198号 邮政编码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 (传真)

排 版 杭州彩地电脑图文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全能工艺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01千
版 印 次 2022年11月第1版 202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4779-3
定 价 7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营销与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571-88904970

目
录

1	第一章 引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目的	1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思路	8
	第三节 几个基本概念	9
	第四节 研究内容	23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26
29	第二章 文化与产权基础的关系辨析	
	第一节 引 言	29
	第二节 文化的同质性和异质性	32
	第三节 文化谱系的核心—外围假说及文化之所以发生的一种解释	35
	第四节 个体和集体意义下的产权基础	38
	第五节 围绕“人”的文化与产权基础及其本质关系	40
	第六节 小 结	44
47	第三章 文化竞争力的本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与中国梦的实现	
	第一节 引 言	47
	第二节 个体和集体的产权基础及其文化竞争力的异质性	49

	第三节	文化竞争力的本质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55
	第四节	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及其竞争力的本质体现	65
	第五节	小 结	68
71	第四章	城镇化、产业升级与土地资本化过程中的产权基础重构与文化竞争力培育	
	第一节	引 言	71
	第二节	产业升级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发展权问题	73
	第三节	产权改革停滞与产权基础重构的可能选择	83
	第四节	有限自由、土地产权与土地资本化对文化竞争力的影响	93
	第五节	产权改革与体制低效的“反公地悲剧”现象对文化竞争力的影响	100
	第六节	小 结	106
109	第五章	公有制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竞争力与文化创新的有效管控和体制保证	
	第一节	引 言	109
	第二节	家庭和家道中的价值观分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	111
	第三节	公有制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竞争力长盛不衰的产权基础	115
	第四节	坚持公有制主体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	119
	第五节	对传统人性假定的扬弃：公有制主体与社会主义人格的养成	138
	第六节	公有制主体下城乡统筹发展中的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新	144

	第七节	公有制主体下制度创新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竞争力的意义	149
	第八节	小 结	152
155	第六章	极端自利与互利合作：产权结构与文化竞争力异质性的现实考察	
	第一节	引 言	155
	第二节	互利合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竞争力的相关案例考察	161
	第三节	极端自利：资本主义文化本质的现实考察	186
	第四节	小 结	204
209	第七章	结 论	
	第一节	对本书研究结论的概述	209
	第二节	存在的不足和研究展望	216
219	参考文献		
330	后 记		

引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目的

理论界关于文化的界定有很多，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①。文化之于经济，从首先研究世界文化形态的伏尔泰，其后继者斯宾格勒、汤

^①“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歧义繁杂的概念。国内对文化的研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亦被称为“大文化”与“小文化”。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则是指如思想、道德、宗教、风尚、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等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组织和制度，主要着重于物质文化之外的精神部分。文艺复兴之后的文化史研究大多是在这种狭义文化的范畴内展开（韩晓莉：《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兼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58—64页）。

因比、亨廷顿等，到维柯、康德和文德尔班的文化哲学^①，再到韦伯的“禁欲苦行主义”^②和维尔纳·桑巴特的“贪婪攫取性”^③，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二者极少关联。而发端于艺术社会学^④的文化经济学则着重于运用经济学的观点开展对文化经济问题的整体研究^⑤。实际上，马克思文化观认为经济是文化的基础，这是目前被理论界忽视的文化与经济二者关系中尤为重要的一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归宿^⑥，而“文化马克思主义”则力图克服“经济决定论”的僵

① 在西方，“文化哲学”这一概念是由德国哲学家、哲学史家文德尔班（Windelband, Wilhelm, 1848—1915）在《文化哲学与先验观念论》（*Kulturphilosophie und transzendentaler Idealismus*）（1910）中首次提出的（刘进田：《文化哲学导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在德语系统里，“文化哲学”和“文化科学”之间的区别可被归纳为：“文化科学”乃专门研究文化和认识文化的方法的学问；“文化哲学”乃研究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总体目的以及如何实现这种目的的学问（周可真：《构建普遍有效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文化哲学的首倡者文德尔班的文化哲学概念的解读》，《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37—41页）。

② 韦伯在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主要分析了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隐藏于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动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关系。韦伯发现，随着新教的禁欲职业伦理观转变为资本主义精神，新教徒所遵循的尽职尽责的宗教伦理就蜕变为纯粹的获取物质利益和享受生活的手段了。

③ 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徐剑：《20世纪中国艺术社会学研究综述》，《学术论坛》2002年第4期，第89—91页；宋建林：《现代艺术社会学导论》，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2页；陈德洪、巫大军：《论当代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民族艺术研究》2013年第5期，第92—96页。

⑤ 参见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戴维·罗斯比：《经济学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名和大郎：《经济与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程恩富：《文化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Gavin Kendall, Gary Wickham: *Understanding Culture*,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1.

⑥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发展观就必须立足于其经典著作，考察其所提出的文化概念的历史语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乃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观的基本逻辑，倡导多元辩证的文化发展观乃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观的鲜明特色，重视文化在社会有机体中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观的重要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发展观对当代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参见张传民：《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发展观及其当代价值》，《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18—22页。

局^①。冷战后，弗兰西斯·福山^②、汤姆林森等主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主导的统一的文化体系^③，罗尔斯则希望容纳多元文化^④。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既要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汲取西方文化的合理

①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史上，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学说大致有三种类型和三个阶段，它们分别是“二战”前后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阿尔都塞学派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的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着力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力图消除异化意识，恢复人的主体性。而阿尔都塞学派则借用语言学结构主义方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创立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凸显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尤为强调将个人“召唤”为“主体”的恰恰是意识形态的结构。从学理的角度看，将二者进行比较，具有重大的价值。参见李林洪、杨兰：《文化，还是结构？——文化马克思主义中的两种范式比较研究》，《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第25—30页。

② 福山尝试用社会资本流失来解释技术进步与道德沦丧这一悖论，并提出借由人的本性（包括理性）来重建社会秩序。参阅弗兰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王胜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立平：《对秩序的忧虑——评弗兰西斯·福山的〈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美国研究》2002年第2期，第142—146页。

③ 汤姆林森用非领土扩张化的过程描述文化的全球化，即文化地方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他认为世界主义是文化全球化的趋势，并且断言这种世界主义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其他各国积极参与统一的文化体系。参阅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怡：《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思想述评——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化观点看》，《江汉论坛》2009年第2期，第114—116页。

④ “多元社会”无论实现在文化层面还是实现在制度层面，对西方学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旦主张文化与制度之间存在着强关联关系，那么无论何种层面上的“多元社会”就都是被排斥和抗拒的；一旦能够有效削弱文化与制度的关联程度，文化层面上的“多元社会”才是受欢迎的。罗尔斯与亨廷顿在这个问题上各执一端，各自提出了极具代表性的解决方案。亨廷顿的“民族性质的方案”旨在借由捍卫和发扬原有单一社会中的主流文化，来抗衡来自多元文化的冲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方案”则意图通过对政治世界的改进，使其能够安全地容纳多元文化。不过，因为这两个方案内部都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在现实社会中同样难于付诸实现。参阅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曹瑞涛：《在制度与文化间徘徊的“多元社会”——罗尔斯与亨廷顿应对“多元社会”方案之比照探析》，《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60—64页。

性^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②。在重视公有制经济

① 我们身处在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多元文化的冲突与碰撞既带来了文化元素的传递与嬗变，又引致了身份认同的彷徨与焦虑。如何重新建构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重塑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一文化选择与文化发展问题正以从未有过的紧迫态势不可回避地摆在每一位国人面前。无须讳言，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既要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承续接继，又要合理地吸收接纳西方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成果。回到文化的源头，融会贯通，锐意创新，此乃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唯有复返中华文化原典，我们的文明创造方有根脉可寻，才会元气充沛；也唯有主动地吸纳西方现当代文化的优秀滋养，借鉴他山之石，方能够使我们传统文化的利弊持尤为清醒的认知，从而在与西方文化的借鉴融合中，推动中国文化自觉的思想起点，拓展中国文化自信的原创空间，坚定中国文化自强的现实出场路径。参阅杜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江海学刊》2011年第3期，第5—7页；黄树森：《中西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江海学刊》2011年第3期，第7—10页；张世英：《和而不同，开创中西马融合的新境界》，《江海学刊》2011年第3期，第10—13页。

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和规范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而且也是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共同面对的重大任务。从目前的情况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和规范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取得了巨大成绩，其具体实现路径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一是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充分融合，使其贯穿统领文化发展繁荣的各个层面，成为广大干部、群众与青年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并能够自觉践行的价值理念；二是大力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努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三是中国共产党要把握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努力提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和规范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工作的能力；四是要加大学术思想的传播力度，创造有利于我国学术思想走出去的更多更好的机会与平台，不断提升我国文化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五是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改进和完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和规范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体制机制；六是加大综合治理党内腐败的力度和强度，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亲和力感召力；七是将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控制缩小在合理范围，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和规范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奠定牢固扎实的经济基础。参阅洪银兴：《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年第5期，第5—10页；刘海藩：《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领导科学论坛（理论）》2013年第2期，第4—5页；程思富、冯颜利：《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学习论坛》2012年第8期，第5—7页；逢锦聚：《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期，第20—25页；汝信：《两种道路 两种前景》，《红旗文稿》2013年第1期，第4—6页；陈奎元：《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第5—10页。

的地位和作用^①的同时，亟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产权基础的关系进行基于实践的具体深入研究。产权既集中体现经济利益关系，又是社会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现实身份的根本基础^②。在产权改革视域的所有制改革中，尤其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我国城市和农村特殊的土

① 国家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要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能够实实在在享受到国有经济的好处。参阅刘国光：《“两个毫不动摇”的当前价值——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石》，《人民论坛》2012年第15期，第47—49页；卫兴华：《为什么说公有制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红旗文稿》2012年第15期，第17—18页；程恩富：《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笔谈（上）：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四个关键词”》，《经济研究》2013年第2期，第12—14页。

② 参阅霍桂桓：《从产权到伦理——跨文化视角下的当代中国伦理问题》，《学术月刊》2008年第2期，第61—66页。

地产权和管理制度^①，土地资本化则尤为引人关注（赫尔南多·德·索托，

① 国外对中国土地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资料介绍。如长野朗（1933）的《中国土地制度研究》收集了河北省二十个县的实际调查以及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的统计材料；R. H. Tawney（1931，1964）的《关于中国农业与工业的备忘录》（*A Memorandum o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China*）和《中国的土地与劳力》（*Land and Labour in China*）中提到了当时中国的土地占有状况并详尽论述了近代中国的土地问题。（2）权利与土地所有制。如张五常（2000）在《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中认为私产包括使用权（或决定使用权）、自由转让权和不受干预的收入享受权，有了这三种权利，所有权是不需要的；仁井田升（1960）在《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着重从法制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等问题，后来的日本学者如滋贺秀三、寺田浩明、岸本美绪、夫马进等继承了这一学术传统。（3）对制度演进的解释。如Michael R. Carter（1999）和杨小凯（2001）认为村干部对责任田的配置权和村组织对责任田的承包费的支配权影响了土地的利用效率，打击了农民对土地的投资信心；Robin Burgess（2000）指出土地的频繁调整使得很多农民拥有很多块土地，实证分析显示这影响了土地的利用效率；Prosterman（2001）指出由于土地会被定期或不定期地调整，农民只是进行一年内就能收回的投入，产量不会进一步提高；文贯中（1994，2002）认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始终在公平和效率之间进行选择。（4）对农户行为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流派：一是以俄国的A. 恰亚诺夫（1996）为代表的组织生产流派；二是以西奥金·舒尔茨（1999）为代表的理性行为流派；三是以黄宗智（1986）为代表的历史流派。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的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环境、资源禀赋与经济系统的自我积累。温铁军（2000）从这个角度为农村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是一个资源禀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性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的发展问题”。（2）公平与效率的内在要求。邓大才（2001）对效率和公平在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博弈及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进行了全新的研究；冯继康和何芳（2001）认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经历了效率和公平的选择过程。（3）利益博弈和诱致性变迁。这方面的代表学者非常多，他们主要是从利益配置的角度出发，将激励问题、利益主体博弈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等看作是导致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演进的主要原因。如林毅夫（1992，2000）认为生产队中每个劳动者努力的边际报酬是监督的函数，监督是保持劳动激励和合作社生产率水平的关键；周其仁（2002）运用产权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基本结论；党国英（1998）认为应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考察国家与所有权的关系；谭秋成（2001）分析了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在变迁过程中的立场；刘守英（1999）利用村庄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分析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后的现状以及变迁的实际路径；曲福田（1997）运用产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提出我国土地制度变迁中土地产权选择的基本原则是产权结构的收益成本比较；钱忠好（1999）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建立了一个用于分析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模型；王小映（2001）认为家庭经营制度中存在着制度改进的收益来源和获利机会，对这些潜在收益的追求导致了土地制度创新。

从我国经济改革的历史特点来看，农村一直都充当着城市产权改革的社会稳定器，这种特殊性进而限制了农村产权改革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空间，使得农村和城市产权改革处于一个非平衡的演进状态。对于以土地为主导生产要素的农业产业而言，这种非平衡可能诱致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对农地的非农化侵占。

2012)^①。所有制改革、城镇化和土地巨额财富的重新分配将建构基于个体或群体的不同的产权基础，从而影响或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

本书拟从分析文化与产权基础的关系入手，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竞争力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的具体体现，认为资本和私有制相结合主导下的经济体制在文化竞争力上是不可持续的；拟探讨在产权改革视域下，所有制改革、城镇化与土地资本化过程中坚守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产权基础对保有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竞争力、实现城乡平衡发展与生态和谐乃至人的和谐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性；拟论证文化创新视域下制度和管理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竞争力的体制保证，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精神复兴”和自我实现，要防止资本借由经济领域对政治的渗透甚至主导；在对以上理论综合反思的基础上，拟选取中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典型案例，如反贫困、乡村振兴、区域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等，从集体意义下的产权基础和集体（整体）主义价值观视角，尝试探讨推崇互利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解决这些涉及全局性的亟须共同发展问题上的竞争优势。通过宏观层面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于文化竞争力优势的重点环节的撷取思考，从总体上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成功的逻辑必然性和未来需要警惕防范的颠覆性错误。与之相对的，施行资本主义的国家，其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呈现出不可调和的矛盾，几近于无解状态。比如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不断“退群”，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如智利、阿

^① 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认为，完善的资产表述体系可以使“僵化的”资产转化为流动的资本，并且能降低交易成本。参阅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

根廷等的频繁骚乱等，一些深层次的难以根除的社会经济问题，都与其产权基础结构和基于其上的个体主义价值观息息相关。本书通过对两种体制下文化竞争力的不同现实表现和发展趋向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竞争力。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思路

本书从分析文化与产权基础的关系入手，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竞争力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的具体体现；探讨了在所有制改革、城镇化与土地资本化过程中坚守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产权基础对保有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性；论证了文化创新视域下制度和管理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竞争力的体制保证；并从国内外选取典型案例进行考察分析。本书在理论分析方面主要运用文献述评、抽象思维和制度比较分析等方法，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竞争力与所有制改革、城镇化、土地资本化及文化创新的关系分析和实证研究方面，综合运用产权理论、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伦理学等的方法，从抽象到具体，以理论分析、应用分析、制度分析、中微观分析和实证分析等为环环相扣逐层深入的研究体系，力求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揭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产权基础对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竞争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三节 几个基本概念

一、文化

文化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和主要对象。人类学从产生以来，先后创立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文化理论，其中，在当代人类学研究中影响尤为广泛的当数 20 世纪 60 年代形成的象征理论。在该理论中，文化被分成可观察和不可观察的两个层次来看待：可观察的部分包括物质文化和能够用标本表达的精神文化与社群文化。尽管可观察的文化是人类学家研究的重点，但是并非其目标所在。文化的第二个层次——不可观察的文化才是人类学家更为关注的，在这里文化是一套一定区域居民共有的意义象征系统，它经由潜移默化形成于人们的头脑中，控制和指引着人们的行为，同时在各个不同的文化领域沟通交流，形成一套和谐的整体。研究者们正是借由对可观察文化的解释从而达成对潜在意义系统的领会把握。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乃文化人类学的代表人物，他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文化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它表示的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他强调，“最好不要把文化看成是一个具体行为模式——习俗、惯例、传统、习惯——的复合体，直到现在大体上都是这样看待文化的，而要看成是一个总管行为的控制机制——计划、处方、规则、指令（计算机工程师将其称为‘程序’）”^①。根据文

^①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第57页。

化象征理论，人类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并非对文化功能或结构的分析，而是揭示各种文化现象和行为所传递和内含的信息和意义，并将这些信息和意义作为文化的核心加以研究，寻求对文化的多层面和多视角的理解。

基于对文化的共同关注，社会文化史和文化人类学具有诸多的相通之处，文化人类学研究者经过几代学人积累凝练的对文化的深入剖析和理解，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好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实际上，很多学者也的确在这方面进行着有益的尝试。比如，中国台湾学者黄克武在谈及台湾地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时指出，“近年来研究转向一个比较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文化观，认为文化是‘族群或社会共享的价值’”^①。在具体研究中，大陆学者也表达了相似的研究取向。程美宝通过对广东地域包括方言、风俗、学术、粤剧等文化诸多层面的描述展现，企图探寻清末民初广东地方文化观形成的多维轨迹，进而挖掘和解释隐藏在这些现象或事物背后的深刻意义，即逾一个世纪以来广东文人如何在地方关怀和国家意识的两条主线中传承和创造出适合的路径，加入自己的思考和贡献，界定自己所认可接纳的地域文化^②。陈春声、陈树良将广东潮州地区东凤村流传的民间故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看作乡民的“历史记忆”，透过剖析这些传说故事的创作、流传和再创作过程，理解和把握乡村历史的“事实”与内在脉络^③。愈

① 黄克武：《导论：映现抑或再现？——视觉史料与历史书写》，见黄克武编：《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第3页。

② 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③ 陈春声、陈树良：《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15—126页。